

## 第一章 城市概述

莆田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境域北连福州，南接泉州，西依戴云山脉，东南濒临台湾海峡。陆域面积 3781 平方公里，拥有“世界不多，中国少有”的湄洲湾秀屿深水良港和三江口、枫亭等辅助港，以及湄洲、南日等大小 150 多个岛屿。管辖莆田、仙游两县，城厢、涵江两区和湄洲岛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1991 年人口 273.96 万人，有汉、回、满、畲、壮、苗、瑶、土家等 33 个民族。还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及莆籍港、澳、台同胞计 60 余万人，其中华侨、华裔 47 万人。世代兴化儿女操独特的莆仙方言，有独特的习俗。这块肥沃的土地，历来为闽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昌盛、经济繁荣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古府新市。

莆仙历史悠久。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已在这里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活动，繁衍生息。境域夏商时属“九州”之一的扬州，西周时属“七闽”地，战国后期属闽越国地，秦时属闽中郡，西汉后期属会稽郡，三国时属建安郡，西晋时属晋安郡，南朝时属南安郡。陈光大二年(568 年)及隋开皇九年(589 年)，二度置莆田县，不久即废。唐武德五年(622 年)，再置莆田县，属丰州(州治今泉州)。圣历二年(699 年)，析莆田县西部置清源县，天宝元年(742 年)改名仙游县。莆田、仙游两县均属清源郡(郡治在今泉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析莆田、仙游、永福(今永泰)、福清部分地置兴化县，建太平军(旋改兴化军)，领兴化县。次年，从泉州划出莆田、仙游两县入兴化军，军治在游洋。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军治移迁到莆田。景炎二年(1277 年)，兴化军改为兴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 年)，兴安州改为兴化路。明洪武二年(1369 年)改为兴化府。正统十三年(1448 年)裁兴化县，属地分别划入莆、仙两县。清沿明制，兴化府属福建省闽海道。民国 2 年(1913 年)废府，属南路道(民国 3 年改为厦门道)。民国 14 年废道后直属福建省。民国 22 年属兴泉省。民国 23 年属福建省第四行政督察区(驻仙游，领仙游、永春、德化、大田、惠安、莆田 6 县)。1949 年 8 月莆仙两县解放后属第五行政督察区，1950 年属晋江专区，1970 年 6 月属闽侯专区(驻地迁莆田)。1971 年 7 月，莆田地区成立，辖莆田、仙游、福清、永泰、闽清、闽侯、长乐、平潭 8 个县。1973 年闽侯县划入福州市。1983 年 5 月，划福清、闽清等 5 个县归福州市。1983 年 9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莆田市。

莆田市位于北回归线北侧，地处北纬  $24^{\circ} 59'$  ~  $25^{\circ} 46'$ ，东经  $118^{\circ} 27'$  ~  $119^{\circ} 56'$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多为海拔 600~1500 米的山峰，东南多为海拔 50 米以

下的沿海岛屿与丘陵台地区，中部为兴化平原和东西乡平原。境域山地约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5%，平原盆地占 20.6%，沿海丘陵台地占 34.4%。地质结构属闽海活化陆台，地质基底为变质岩系，盖层西北部为中生代火山岩，中部为火山岩和燕山期花岗岩，皆属红壤、黄壤地带，东部及东南部由花岗岩、红壤台地、残积层和第四纪河海交互沉积层等组成，地表组成物质除基层外，有残积、坡积和风积等 5 个成土母系类型。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林地 23.9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62.1%，森林覆盖率达 50.8%，木材蓄积量 410.29 万立方米。各类草地面积 9.8 万公顷，载畜量 6.3 万头(牛单位)。沿海滩涂面积 1.84 万公顷，可利用率为 76.5%。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有众多的天然河。贯穿境内的溪流有木兰溪，干流全长 105 公里；延寿溪，干流全长 57 公里；萩芦溪，干流全长 60 公里。水能理论蕴藏量 34.75 万千瓦，陆地水域面积 1.35 万公顷，地表水年均 34.34 亿立方米，内陆地下水年补给量 3.08 亿立方米，尚有 6 处 21 个点的表露地热资源。地下矿藏已探明的有铁、锰、铝、锌、镍、银、钙、钨、铀、黄铜、铁砂等有色金属类矿石，有高岭土、蛇纹石、滑石、叶蜡石、花岗岩、钾长石、硅线石、冻石、水晶、砖瓦用粘土、铝土、明矾等非金属类矿石，自山区到沿海广泛分布。

莆田市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物产品多质优。境内平均气温为 16℃~21℃，年均降水量 1000~2000 毫米，平均地温 23℃~24℃，无霜期年均达 316 天，十分有利植物生长、动物生息。境内有维管束植物 215 科 1403 种，其中有松、杉、竹、楠、栎、椿等用材林树种；有木麻黄、相思树等防护林树种；有油桐、油茶、板栗等油料树种；有山苍子、乌地、柠檬桉、棕榈、山黄麻、龙舌兰、桑树等化工纤维原料树种；有梅、月季、山茶、杜鹃、茉莉、白玉兰等花卉及柏、椿、榕树、梧桐等观赏树种。已鉴定的中药材资源有 203 科 814 种，其中有三尖杉、山杜仲、猕猴桃、金银花、银杏、黄连、肉桂、喜树、金线莲、列当、石花菜等贵重植物类中药材。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甘薯、大豆等粮食作物，有甘蔗、花生、油菜籽、黄麻、烟叶等经济作物。有誉称“莆田三大名果”的荔枝、龙眼、枇杷以及柑橘、文旦柚、橄榄、香蕉等 51 个果树种类，还有食用菌、真菌 2 纲 7 目、26 科 78 种，现有野生、栽培和引进的食用菌 4 目、12 科、17 种。野生动物资源有分布于海洋及淡水生态系统的水生动物 549 种和分布于森林生态系统的陆生动物 37 目 500 种。饲养的动物有牛、羊、猪、马、骡、驴等牲畜，鸡、鸭、鹅等家禽以及兔、蜂、鸟等，且有大量发展的鱼、虾、蟹、贝、藻五大类水产养殖动植物。故莆仙有“鱼米之乡”、“水果之乡”以及“蔗糖之乡”的美称。

境内风光旖旎，奇山秀水星罗棋布。有巍峨秀丽的群山，有诗情画意的水乡，有灿若珍珠的宝岛，还有宛如彩练的溪河。在仙游，有“福建三绝”之一的幽洞名瀑九鲤湖，有曲溪怪洞的“小武夷”麦斜岩，有山灵水秀、峭壁千仞的菜溪岩，有云际危楼、神奇险峻的天马

山，还有晴云化鹤的仙门寺、双塔凌云的龙华寺、万石烟罇的园通寺、瀑泉跃鲤的灵山寺，以及飞泉洒雪的九龙岩等佳景和金钟伏地的天竺山，岩茶飘香的九龙山；在莆田，有雄伟磅礴的壶公山，有山奇岩怪的九华山，在它的西部崇山峻岭中，既有秀丽多姿的东圳水库人工湖，又有藏龙卧虎之地的夹漈山和有“古囊列”之称的囊山；市区“荔城”，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有大自然神工斧凿造就成的“东岩晓旭”、“西岩晚眺”、“梅寺晨钟”、“西湖水境”、“木兰春涨”、“寿溪钓艇”、“石室藏烟”、“智泉珠瀑”、“钟潭噌响”等景观，尤有苍松翠柏的凤凰山，既是一座森林公园，又是一座宗教名山，山上千年古刹广化寺，为福建“四大禅林”之一，也是福建十佳风景区之一。其景令游人流连忘返。今天，勇于开拓的莆田新一代，用勤劳的双手再创建凤凰山公园、烈士陵园、梅峰寺等新景观，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为古府新市增添新的光彩。

优越的地理位置，旖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莆仙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早在秦时，境内就出现了刀耕火种的初始农业。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氏族避乱南迁，与境内先民共同耕山馭海，加快了境内的经济发展进程。至南北朝的梁、陈时期，今莆田的南北洋平原和仙游的东西乡平原已具雏形。随着农业的开发，人口的增加，手工业、商业和海运业逐渐兴起。当时境内有纺纱、织布、刺绣、竹木、冶铁、造船等手工业，秀屿港和莆口港已有海运，仙游度尾出现三月商店。陈光大二年(568年)莆田置县(其辖境相当于今莆田市的范围)，标志着境内的经济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唐代开始，莆田县就一直为“望县”(一等县)，为福建的主要经济区域。农业结构由单一的粮食种植转向多种经营。到中唐时期，莆田开始兴修较大型的水利工程。建中年间(780~783年)兴建的延寿陂，元和八年(813年)兴建的红泉堤堰，灌溉面积达万亩以上。同时，修建了南北洋大堤和镇海大堤，至此，莆田平原形成，为福建沿海四大平原之一。境内开始大量培植荔枝、龙眼、枇杷等果树，仙游县开始种植甘蔗，迎仙、白湖两海港开始兴盛，西天尾已有“十日一墟”，菘芦出现9家商店，商业、水产业、盐业和糖业日臻发展。唐末“五季之乱”，中原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进入莆仙两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人口已达16万人，仙游也上升为望县。

宋代是兴化经济迅速发展走向繁荣的时期。水利建设继唐代的延寿陂后，又修筑南安、太平、木兰三陂，构成了灌溉莆田南北洋平原的四大水系，使原来木兰溪下游的大量滩涂、盐碱地开发为良田。同时仙游、兴化两县也修筑陂塘数百座，大大增加农作物灌溉面积。宋初引种耐旱的占城稻，使水稻播种面积进一步扩大，经济出现良好势头。人工种植杉、松、茶，水产业有滩涂养殖。子鱼、紫菜、牡蛎和荔枝被誉为“闽中四美”，上市销售。龙眼焙制品兴化桂圆闻名海内外，仙游的茶叶“月中香”被列为贡品。制糖、制盐、制瓷、造船、

印刷、酿造等行业兴起，商业市镇逐步形成，秀屿、枫亭等港口成为货物的重要吞吐港，境内的蔗糖、桂圆及瓷制品远销省内外。建筑业方面，境内建桥梁 50 座，筑陂坝 1537 座，居省内各县之首，其中木兰陂是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南宋，兴化经济呈下降趋势。境内“三山六海一份田”。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多地少日益突出，“十室五六，无田可耕”的局面开始出现。

宋景炎二年(1277 年)，元军屠兴化城；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 年)，连续 9 年的亦思法杭兵乱，兴化人逃往江西、浙江、广东、海南和东南亚等地谋生。元朝廷的海禁政策，致使兴化商业萧条，造船、瓷器等手工业衰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户口锐减。

明代初期，朝廷在实行海禁的同时，在全国各府县编定《黄册》(户籍)和《鱼鳞图册》(地籍)，全面清丈耕地和山地，厘定赋税，境内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耕地面积到明代中期增加 10 多万亩，境内开始出现专门从事某一行业和手工业的户口，如山区的竹编、漆器，仙游的制糖，莆田平原的食品加工，沿海的陶器、水产、制盐等。莆田首创的晒盐法得到全面推广，制盐灶户达 2000 多户，分成 31 个团，年产海盐 800 多万斤，成为兴化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但山区由于赋役苛重、瘟疫流行、虎患频繁，仙游县人民一度“惧赋逃亡”，兴化县人口锐减至 400 户，财政无法维持。明朝廷于正统十三年(1448 年)裁撤兴化县，将其地并入莆、仙两县。

明代中期的倭寇之乱，又使莆仙两县的平原和沿海民众遭受杀戮，宁海港荒废，市镇衰落，兴化经济衰败。明代后期，由菲律宾引进番薯和烟叶在境内种植，给兴化农业经济输入新机，基本上解决了境内的粮荒问题。随着海禁逐渐松弛和兴化农业经济的发展，海运业重新兴旺，湄洲湾的秀屿、前运、东沙一带商船云集，三江口港取代宁海港成为兴化湾的重要港口。兴化人在境内发展盐业、水产加工、果品加工和烟叶加工的同时，还纷纷外出经商，做生意，足迹遍及江浙、东南亚各地，有“无兴不成镇”之誉。当时，今莆仙两县的大多数乡镇所在地已经形成集镇。历经修葺、扩建的兴化府城规模宏伟，号称“石兴化”，与“铜延平”、“铁邵武”并称为福建三大名城。

清初的“截界迁民”，使莆仙两县 44 万亩的良田抛荒 20 多年，莆田县的地籍损失了一半。界外居民被迫内迁，流离失所。兴化农业经济再一次遭到空前的洗劫。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全部复界。清朝廷又采取“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兴化土地才大量垦复。至雍正年间(1723~1735 年)共有耕地面积 143 万亩，比明代后期增加 10 余万亩，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传统的海运业和各项手工业始复兴盛。涵江、荔城、枫亭、鲤城四镇商业扩展为 16 大行业。涵江有 56 个行业、700 家 3000 多人，其中有 10 家大商行号称“百万富甲全郡”。在省内外的兴化商铺有 200 多家。

兴化桂圆、米粉、蔗糖、食盐、茶叶等成为出口的大宗产品。

清代后期，洋货开始进入兴化市场，兴化经济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涵江还出现外商的代理商行，经营煤油、棉纱、洋布、西药等商品。光绪十六年（1890年）美籍传教士蒲鲁士夫妇主持兴化美教会以后，在境内创办纺织、印刷、碾米、炼乳、肥皂、化肥、火电等近代工厂。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境内也出现大商行、钱庄、邮电等新行业。航运开始轮船运输，开通了至福州、厦门、上海、香港的海运航线。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清朝廷为支付“庚子赔款”，加征“地丁银”，兴化府县官吏乘机额外浮收，农业经济停滞不前。境内以番薯为主粮，并进口缅甸大米。官吏还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取利，罂粟一度漫山遍野，为害无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虽然有“平均地权、土地固有”的规定，但未能实行。莆田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分别占农户数的53.5%、31.6%、14.9%，仙游占42.4%、27.9%、29.7%。抗战时期，秀屿港被日机炸毁，福厦公路莆仙路段全部破坏。国民政府以“军事需要”为名，占用南安陂水利设施，并拆毁境内城墙、寨堡，沿海饱受日、伪军骚扰破坏。当时，三江口港是福建惟一未被日军封锁的海港，促使涵江商业空前繁荣，成为闽中的经济中心，号称“小上海”。民国35年（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后，各级官吏趁机勒索贪污，滥捕壮丁，加派捐税，民众苦不堪言，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据民国38年统计，莆仙两县社会总产值1.69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1.23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51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27.4%），国民收入1.142亿元，人均收入仅57元，稻米占有量不足9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走过了困难和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50年代初，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胜利地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开展了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重点打击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及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同时清除旧社会遗留的吸毒、嫖娼、赌博、婚姻买卖、封建迷信和封建械斗等恶习，稳定社会秩序。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发放贷款，扶植其恢复生产。随后又对工商业进行调整，着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体制，稳定市场物价，打击和取缔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经过政治、经济一系列措施，广大民众实现耕者有其田，调动了积极性，生产力得到解放，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据1953年统计，社会总产值2.772亿

元，工农业总产值 2.366 亿元，国民生产总值 1.982 亿元，比 1949 年分别增长 63%、56%和 53%。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于 1956 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已形成。通过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极大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实现。在“一五”期间，农业稳定增长，仙游、莆田糖厂和一批食品、纺织、家具、五金制造业先后建成投产，改变了境内的经济结构。1957 年，社会总产值 3.981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2.947 亿元，国民生产总值 2.6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439 万元。经济发展，效益提高，市场也繁荣，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进入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的 1958 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左”倾错误泛滥。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兴办“公共食堂”，毁掉大量林果树，砸掉许多铁锅，农业丰产不丰收。1959 年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左”的错误继续扩大，造成经济秩序混乱、重大经济比例失调，大多数企业亏损，工业总产值从 1958 年 1.073 亿元降到 1962 年 6033 万元，年均递减 10.9%。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遭受挫折。但群众的热情未减，1958 年动工兴建的莆田县东圳水库于 1960 年 4 月竣工，有效灌溉面积达 30 万亩，成为莆、仙两县最大的水利工程。

1963~1965 年，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关系基本上协调，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 年，境内有工业、企事业单位 201 个，工业总产值 9085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1%，比 1949 年增长 57.5%，年均递增 5.2%；财政收入 3811.83 万元，比 1953 年增长 149%，年均递增 12.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 10 年中，中共莆仙两县县委和人民政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也出现过失误。1957 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革命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 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 年“反右倾”斗争，“左”倾错误给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觉察到出现的失误及其危害后，从 1960 年开始，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并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地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为“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帽子”。由于采取这些正确措施，境内的国民经济得到顺利的发展。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之中，

正常的生产秩序受到破坏，给莆仙两县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由于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的限制，经济建设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仍然取得进展。在此期间，境内修筑了东方红水库和外度引水渠等大中型水利工程。推广“杂优”等优良水稻品种，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获得显著提高；还兴建了合成氨厂等大型企业。1976年，境内社会总产值4.821亿元，比1965年增长24.9%，年均递增2.3%；工农业总值3.785亿元，比1965年增长27.3%，年均递增2.5%；国民生产总值2.685亿元，比1965年增长8.6%，年均递增0.8%；国民收入2.284亿元，比1965年增长7.7%，年均递增0.7%；人均收入110.91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莆仙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1976年10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此时至1978年11月的两年中，莆仙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工作开始走向正常。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生产大发展，莆仙的经济发生明显的变化。1983年，境内社会总产值10.17亿元，比1976年增长111%，年均递增15.8%；工农业总产值7.291亿元，比1976年增长92.6%，年均递增13.2%；国民生产总值5.807亿元，比1976年增长116.3%，年均递增16.6%；国民收入4.826亿元，比1976年增长53.6%，年均递增15.9%。

1983年建市后，境内实现由种养业为主的农业型经济向加工业为主的工业型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向市场商品经济转化。这个时期，农村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出现一批专业户、专业村、亿元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资”企业发展壮大，工业生产出现了全民、集体、“三资”、私营企事业全面发展的局面。全市涌现出食品、制糖、电子、鞋革、机械、建材、化工、塑料、纺织、轧钢10大主要工业行业；建成甘蔗、食用菌、鳗鱼、水果、奶牛5个工业生产基地；形成食糖、鞋革、罐头、电机、电子5大拳头产品。仙游获得“蔗糖之乡”的称号，莆田被誉为新兴“鞋城”。198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6.56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5.9%，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1991年，全市有工业企业482个，其中全民企业83个、集体企业336家、“三资”企业55个，个体私营企业8个。工业总产值31.05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9%，比1983年增长7.72倍，年均增长31.1%；比1949年增长73.48倍，年均递增10.8%；财政收入2.094亿元，比1983年增长187.2%，年均递增14.1%。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境内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是交通事业发展迅速。秀屿港区各类码头相继投入使用，开辟了湄洲湾 10 万吨级航运，建成 3000 吨级盐业码头和商业码头，开通了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运线路。1991 年，全市水路货运量 65.29 万吨；通车公路 1004.91 公里，80% 的村通了公路；桥梁增至 302 座，长度达 8163.6 米。

二是邮电事业发展迅猛。全市有邮电局代办所 134 个，自办邮电所 49 个，代办所 85 个，职工 871 人，市话 6116 户，农话 2496 户，长话交换机 2 排 660 门，市话自动交换机 18088 门，农话交换机 40 部 7960 门，农话载波终端机 68 路，实现了乡村通电话。开通的程控电话可与国内 500 多个城市及国外 182 个国家和地区通话。

三是商业繁荣。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开放型的流通新格局。1991 年，全市有各类市场 83 个，专业市场 11 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1.583 亿元，其中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品 10.045 亿元，占 86.7%；农村生产资料消费 1.538 亿元，占 13.3%，比 1983 年增长 65%，年均递增 12.6%。

四是拓宽对外贸易渠道。“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立，为对外贸易创造生机。1991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 3.120 亿美元，比 1979 年进出口总额 1634 万美元增长 18.1 倍。工缴费收入逐年增加，劳务出口业务不断增长，创汇达 18.62 万美元。

五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1991 年，全市财政收入 2.094 亿元。由于财政综合实力增强，1984~1991 年用于旧城镇改造、城市公路、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供水、供电及发展广播、电视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逐年增加，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六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1 年，城镇居民年均纯收入 2275 元，比 1983 年增长 3 倍多；农民年均纯收入 846 元，是 1965 年的 20 多倍。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粮食消费逐步减少，鱼肉蛋等副食品消费不断增加，向营养、风味、保健、多样化的配膳结构方向发展。衣着款式朝新颖化方向发展。居民购套房、农民建新房，家具和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等在家庭中已十分普遍，部分专业户还建别墅、购小车，过上富裕生活。

古代，莆仙人民在长期耕山驭海斗争中铸就了坚毅、果敢的性格，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暴的战斗献身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境域战事频繁，莆仙人民面对时局，以各种方式，英勇地进行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推动莆仙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诗篇。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政权建立后，当时据守漳、泉两州的仙游人陈洪进顺应历史潮流，毅然脱离南唐政权，把漳、泉两州包括莆田、仙游在内的 14 个县纳入宋朝版图。陈洪进“纳土归宋”的行动使莆仙两县人民免遭战乱，为中国的统

一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宋初年，游洋爆发了林居裔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一再击败官军，曾一度威胁泉州。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宋政权却受到很大的震动，宋太宗为削弱人民的反抗情绪，提出“兴德化民”，设兴化军，置兴化县。莆仙人民的反压迫斗争，使境地行政地位上升，兴化地域成为福建的八闽之一。

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北宋灭亡。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建立南宋政权。兴化虽然远在后方，但兴化人纷纷赴前线抗金，叶、林师益等人参加东京保卫战。青年时代的郑樵、郑厚兄弟上书请缨捐躯报国，但受投降派压制，未能实现，只好发愤著书，留下《通志》瑰宝。莆人李富捐家财募义兵 3000 人北上抗金，隶属于名将韩世忠部下，不受官职，回乡从事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捐资建造桥梁 50 余座。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八闽诸州相继陷落，南宋朝廷沦为海上流亡政权，兴化成为福建惟一的抵抗元军之地。陈文龙力守孤城，城陷被俘。他坚贞不屈，与其母同绝食殒身。他的族叔陈瓚临危不惧，起兵收复兴化。兴化军的壮举，使它与在江西坚持抗元的文天祥和广东海上的宋朝廷形成海陆三角遥相呼应的声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宋朝廷升兴化为兴安州。元军为保障其南进的后方，调重兵猛攻兴化。兴化军民坚决抵抗元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城陷，3 万军民壮烈战死，史载当时“血流有声”。兴化人的民族气节，在南宋覆亡的过程中，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元代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元朝对南人的民族压迫，激起了兴化路农民的多次起义。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 年)，陈一壶、陈君信、刘广仁等各路起义军曾三度攻陷仙游县城，并进攻兴化路城，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民族气节永存。当年旅居泉州的亦思法杭(在今伊朗)人赛甫丁、阿迷里丁等发动叛乱，企图在福建沿海建立“亦思法杭国”。他们进兵争夺兴化 3 县，亦思法杭兵乱在兴化路持续 9 年。兴化人在这场兵乱中惨遭蹂躏，数万人死于兵乱，导致户口锐减，村落为墟。兴化人民对叛军恨之入骨，当叛军在兴化城下被最后消灭时，流散残兵全被四乡农民击毙。

明代，倭寇窜扰中国东南沿海，明朝廷为防御倭寇，在莆田东南部建平海、莆禧两卫城，又在各要冲地带建立迎仙、青山、嵌头、吉了、枫亭等军寨。倭寇于明初曾窜犯平海，被守军击退。到明代中期，政治腐败，海防废弛，倭寇大肆抢掠莆仙平原沿海地带，给兴化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府城附近的荔浦村民众奋起自卫，官军竟坐视不救，导致“寇屠荔浦村，河水为赤。”平海卫城和离府城不远的林墩也被倭寇盘踞。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戚继光率军自浙江入闽，歼灭了盘踞林墩的倭寇。但倭寇乘戚军回师浙江之机，纠集几万人于同年十一月底攻陷兴化府城，全城自知府奚世亮以下 3 万人几乎全部遇难。兴化是当时东南沿海惟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八闽为之震动。明朝廷急调戚继光率军援闽。次年三月，明军歼灭

了盘踞平海卫的倭寇。之后，倭寇又纠集万余人围攻仙游县城。仙游军民在戚继光部队的援助下进行英勇的县城保卫战，坚守 50 多天，刘君芳等壮士在与登城倭寇的搏斗中死战不退，壮烈牺牲，县城屹然不动。年底，戚继光大破倭寇于仙游城下，倭寇残部流窜惠安，兴化倭患才最后平息。在这场陷城事变中，明朝廷动用了浙江、江西、广东 3 省人马，花费 300 万军费，终于清除了兴化的倭祸。

明末清初，兴化人民联合郑成功的部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清斗争。明遗臣朱继祚、林兰友等也起兵响应，抗清义军一度攻陷府城。郑成功的部队攻克平海卫和仙游县城后，清军全力反攻，大肆杀掠。兴化抗清义军失败，郑成功退据南日、湄洲等海岛，与厦门、金门接连一片，以抵拒清军，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渡海，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清政府对大陆的统治渐趋稳定，为防御郑成功与内陆人民联合反清，竟下令在福建沿海“截界迁民”，把兴化自枫亭经壶公山、天马山转向北侧入岸沁截界，强令沿海居民内迁，把界外的田园、树木、村庄悉数焚毁废弃。莆仙两县数万人流落界内，无家可归，44 万亩耕地抛荒，几乎占整个莆田县耕地面积的一半，明代十分繁荣的秀屿港以及平海、莆禧两卫城也告荒废。康熙十一年(1672 年)复界后，界外荒地虽然逐步垦复，但造成了莆仙沿海 200 多年的贫穷落后难以恢复的严重后果。康熙十三年(1674 年)，又发生了驻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伙同吴三桂、尚可喜的“三藩”叛清事件，兴化民众又遭到一场浩劫。莆人彭鹏不顾耿精忠的威胁利诱，坚决拒绝耿的征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在这期间，清军平定了“三藩”叛乱，攻占南日、湄洲等岛屿，并从平海渡海攻占澎湖、台湾，海峡两岸重归统一。

清代后期，兴化农民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配合永春红钱会首领林俊攻克仙游县城，建立农民政权，改仙游为“兴明县”。反清义军多次击败清军的反攻，击毙仙游知县、兴化府通判和清军参将等多人，并大举围攻兴化府城。清军一面竭力守御，一面由陈池养等缙绅组织地方武装“团练局”和乡兵，联合镇压。围城义军遭到守军和新度“南洋乡兵”的夹击，撤回仙游，在濞溪又遭到当地乡兵的伏击，损失惨重。最后清军调集永安、厦门、兴化 3 路人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攻仙游，并袭击起义军后方九座山，大肆屠杀参加起义的“乌白旗”会众和无辜群众，林俊被迫退出仙游。十几年后，清军又镇压了莆田的小刀会起义，兴化反清斗争最后失败。在这场斗争中，莆仙两县的“乌白旗”会众联合反清起了重大作用，但起义失败后，“乌白旗”势力却恢复了初期的封建械斗状态，造成近百年莆仙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开始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莆仙两县爆发反北洋军阀的斗争。民国元年(1912 年)，莆田人黄濂领导人民抗捐抗税，接着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军曾两度攻入仙游县城。黄濂不久病逝，起义失败。民国 6 年，孙中山在广州组

建护法军政府，仙游人张约在五坪寨(在今郊尾境内)组织护法民军，通电响应。尔后，莆仙各地纷纷出现护法民军。次年，广东护法政府所辖的许崇智部粤军和莆人杨持平所部的闽南护法军进驻莆仙，收编各部护法民军(莆仙人称之为南军，称北洋军阀驻军为北军)，攻占仙游。接着南军各路合力围攻莆田，许崇智部在梧塘、涵江一线与福州南援的北军激战。莆仙人民反北洋军阀的斗争演变成莆田持续4个月的南北军战争。由于驻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擅自与福建督军李厚基议和，许部被迫撤回。指挥进攻莆田的张约在南门作战中阵亡，南军退回仙游。此后十几年，莆仙民军各据山头，抢占地盘，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仙游民军挂着“护法”招牌，山头林立，互相攻杀，残害百姓。出现了以吴威为首的“外团”和武定国为首的“内团”混战的局面。他们往往任意杀人放火，勒派捐税，吴威向民众勒派的“老鼠捐”(每日征一次苛捐)为害尤烈。在莆田则出现北军借口“收编”残杀民军数百人的事件。民国16年，北伐军入闽，收编莆仙各部民军，仍未能制止割据山头的局面。著匪郭楼古盘踞莆田南坛，使今萩芦、梧塘两地居民惨遭荼毒达8年之久。直至民国22~24年，十九路军驻闽之后，莆仙两县的这些山头势力才被基本消灭。

清末，莆仙人民就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除了武装起义外，还有仙游人民反抗教会占地盖教堂而驱逐传教士和涵江人民反对美国买办占地盖油库的斗争，以及莆田人民抗捐税，捣毁禁烟公所的斗争。民国初期，莆城学生多次举行罢课、示威，声援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上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同时掀起抵制、销毁日货运动。民国15年，莆田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在哲理中学钟楼成立。并于次年分别成立中共莆田、仙游两县县委。尔后建立农民协会，执行中共中央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协助国民党莆仙地方组织建立两县的国民党县党部。民国16年“四一二”政变前后，驻莆田国民党军队抄、砸中共莆田特委机关，福州城防司令吴威指使部下发动仙游的“四一四”政变，捕杀国民党县党部人员，莆仙中共组织开始转入武装斗争。在山区建立游击队，在沿海一带发动抗捐暴动，特别是反抗“烟苗捐”。罌粟自清末在枫亭种植，后蔓延到仙游境内和莆田灵川一带，地方当局借此向这些地区勒收“烟苗捐”渔利。中共组织领导莆仙群众和青年学生开展反抗烟苗捐的斗争，捣毁多处税所，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镇压。民国19年，在莆田、仙游分别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07团、第108团，并在新县外坑乡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革命力量受到挫折，红军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战争。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共在莆仙组织“抗日十人团”，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并于次年重新建立莆田工农游击队。

民国21年，莆仙国民党军阀何显祖派兵镇压灵川东沙群众反抗烟苗捐的斗争，打死打伤群众78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东沙惨案”。在莆仙人民的愤怒声讨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

国民党当局被迫扣押何显祖。民国 22 年 11 月，十九路军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急调五路大军入闽讨伐。次年 1 月，十九路军退出福州，全线南撤，第四路军宋希濂部自福州渡峡江南追十九路军主力，第五路军卫立煌部自尤溪经永泰入仙游，进攻十九路军的侧翼。十九路军的后卫部队在莆田城北七溪桥和莆仙交界处的长岭、梅塘一线顽强阻击中央军的两路夹击，掩护主力南撤泉州。但十九路军部分领导人在泉州通电拥蒋，接受改编，“福建事变”也告结束。

在这个时期，境内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重建了莆田中心县委和仙游县委，建立了广业、常太、兴泰等游击根据地，并成立广、常、兴边区工委，把莆仙红军游击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捐、抗税、抗债斗争。接着又开辟了莆(田)永(泰)边区根据地。国民党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趁中央红军长征，莆仙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时机，于民国 25 年集中优势兵力多次围攻常太、游洋、东乡等根据地，烧劫祭川、顶外坑等村，并于同年 10 月组织莆田、仙游、永泰 3 县兵力，3 路围攻山溪根据地。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转移到外线作战。先后在长岭、笏石、黄石等地袭击敌人，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民国 26 年初，发生中共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等 5 名成员在莆田洪度村被捕遇害事件，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挫折。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中中共组织和红军与莆田国民党当局及驻军达成合作抗日协议，闽中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80 师特务大队，保持独立编制和独立领导权。可是第 80 师 239 旅旅长钱东亮公然违反协议，于次年 2 月一手制造了震惊八闽的“泉州事变”。秘密捕杀特务大队领导人刘突军，收缴了驻在泉州承天寺的特务大队枪支。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严正抗议下，钱东亮才被迫交还枪支。特务大队也整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二连，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期间，莆仙两县遭到日机的频繁轰炸，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多处学校、医院和秀屿港的仓库、码头均被炸毁。同时，天花、霍乱、鼠疫等恶性传染病连年发生，瘟疫严重的村庄在几天内就死亡几百人。日军又不断骚扰沿海岛屿。莆仙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地方当局为了防备日军入侵和轰炸，把境内公路和两县县城、卫城、寨所的城墙全部拆毁，成立莆(田)、仙(游)、永(春)、福(清)游击总队，一方面防御日军，一方面又用以对付共产党的活动。抗战后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摩擦加剧，顽固派袭击中共领导的忠门乡自卫团，后来又两次围攻驻仙游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莆仙党组织在红军改编北上后，在闽中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战初期，执行中共福建省委“到沿海去，开展海上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忠门建立抗日据点，成立沿海特别区，建立海

上游击队，在南日、湄洲、乌丘等地与日伪军周旋。在山区建立交通线。抗战后期，党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采取自卫方针，击退顽军对省委机关的围攻，袭击反共的省保安司令严泽元和涵江交通银行，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特务制造“东吴事件”，在忠门东吴杀害坚持海上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共莆田县委书记张伯庭等人。闽中党组织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山区，抗日武装改编为闽中人民游击队，发动了江口上林亭战斗，截缴福州押运现钞到莆田的运输队，在莆仙两县广泛发动学生罢课、罢考和人民群众抗丁、抗粮、抗税运动。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滥抓壮丁，征粮派款，闽中中共组织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一面把福清、莆田的游击队合编为戴云纵队，一面广泛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民国 36 年，戴云纵队在挺进永春的战斗中受挫折，回莆仙坚持斗争。连续袭击江口、北高等镇公所，缴获枪支，开仓济民，同时在城区发动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民国 3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在莆田大洋成立，统一指挥莆田县游击队和仙游县的仙德大队。随后多次进攻莆田的笏石、涵江、忠门、武盛、常太、平海、北高等镇(乡)公所和仙游的晋仙警察所与古邑乡公所，拔除大洋渡口的国民党据点，建立仙游的岭西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政权已土崩瓦解。但莆仙的国民党县长陈文照、宋庆烈仍顽固推行“剿共”政策，他们连续袭击中共莆田县委驻地清江和珠江、岭西根据地，并于 7 月底纠集莆田、仙游、永泰、福清 4 县共 3000 多人的兵力，四路围攻大洋根据地。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二十九军的侦察营已进抵大洋，与闽中游击队会师。国民党军队在激战 3 天后仓皇撤退，陈文照、宋庆烈等逃往金门，莆仙两县在 8 月下旬先后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在莆仙境内潜伏下大批残余力量，形成几十股匪徒，大搞破坏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又多次轰炸城乡和海上民船，窜犯南日、湄洲等岛屿，造成人员、财产的重大损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莆仙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土地改革，摧毁国民党反攻复辟的社会基础。在境内发动群众，组织民兵等人民武装，进行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至 1951 年，国民党潜伏力量和经济土匪基本被肃清。在这期间，莆仙军民全力以赴地进行反窜犯斗争，多次歼灭登陆骚扰的国民党特务。人民政府组织工程队和民工突击抢修城区至沿海的战备公路，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对南日、湄洲等海岛的窜犯活动。同时，莆仙人民踊跃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还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旧中国长期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天花、霍乱、鼠疫等恶性传染病。境内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

1949年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54年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6年建立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享有广泛的参政、议政、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社会民主生活曾一度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的法律遭到践踏，共产党组织陷于瘫痪，当时实行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所谓的“大民主”，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共产党的组织经过整顿，更加坚强有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得到完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按照各自的特点，积极参与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人民政府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各种渠道，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克服领导制度、管理制度、工作方式上的缺陷，兴利除弊、民主施政。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逐步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从各方面支持、监督司法和行政部门正确行使职权，实行依法治市，稳定社会，调动积极性，确保莆仙经济稳步发展。

兴化儿女经过长期的磨炼，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莆田建市以来，全市开展以创建“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为中心的文明城市活动，广泛进行“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人们的传统美德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道德风尚得到发扬，文明单位、文明个人、文明家庭不断涌现，一大批劳动者荣获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青年突击手等光荣称号，兴化儿女以崭新的风貌建设社会主义新莆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境内教育兴盛，文化灿烂，人才辈出，名人相继，形成“莆田地狭而人物盛”的局面。历代科甲鼎盛，政坛风流，名扬全国。在这块海滨宝地上，曾哺育出2345名进士，12名状元（其中武状元3名），14名宰相，有过“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科二状元”、“魁亚占双标”、“兄弟两宰相”、“父子兄弟同朝为官”等科甲佳话。自唐代以来，位居相位，官至六部尚书、御史、布政使、郡守以及学者名流，群星璀璨，彪炳史册。在中国二十四史中立传的有98人，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的有38种650卷，成为闻名遐迩的“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直至现在，莆仙人才之盛，雄风大展，令海内外刮目相看。

人才基于教育，莆仙的教育源远流长。早在莆田第一次置县之前的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名儒郑露3兄弟就在凤凰山下建湖山书堂讲学。唐代，境内书堂日益增多。宋代，建立军学、县学，随着科举中式的日益增多，兴化教育日渐发达，曾有“十室九书堂”的称誉，出现了“家贫子读书”的兴教重学局面，其盛况历明、清而不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

境内普遍开办中小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化民众存续兴教重学遗风，学生入学人数逐年上升，教学质量不断提高。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莆田县连续三年获得全省高考红旗。建市后，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在普及中学教育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兴化大学、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及各类职业中专学校，为国家培养输送大批人才。

莆仙教育发达，促进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诸方面的繁荣，古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东南壮邑”之盛誉，今有“戏剧之乡”、“绘画之乡”、“田径之乡”、“武术之乡”的美称，举世瞩目。

(一)著述宏富。莆仙人自古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著作甚多。据查，唐 25 部、宋 2632 部、元 60 部、明 944 部、清 470 部。在这浩如烟海的著作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文化瑰宝，是丰采照人的遗产，对传播华夏文明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极大影响。近几年来，莆仙古籍越来越为专家和出版界所重视。1980~1990 年初，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宋代莆仙古籍就有 25 种 265 卷。

(二)词赋名世。莆仙以“诗书为八闽之甲”称誉。唐末，莆人徐寅有诗 217 首被收进《全唐诗》。宋朝，莆仙有 11 位词人作品被收入《全宋词》。南宋是“词”高度繁荣的时代，境内王迈、方信儒、刘克庄等著名爱国诗人和词人，成为当时词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为后人传颂。

(三)戏剧扬名。境内民众在长期的经济开发中，融合中原的文化传统，车鼓、十音八乐、舞龙、舞狮、弄九鲤、游灯等文化形式与莆仙群众文化习俗有机结合，在唐代后期就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百戏”，历代流传不衰。现今的莆仙戏有传统剧本 800 余本，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戏剧推陈出新，百花盛开。1959 年，仙游鲤声剧团晋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演出，上演的《团圆之后》饮誉京城。80 年代及 90 年代，莆仙两县陆续上演的优秀传统剧目和新编的历史剧《春草闯堂》、《状元与乞丐》、《秋风辞》、《新亭泪》、《刘贺登基》等剧目在京演出，誉满京华。

(四)书画留芳。历史上莆仙出现 3 位大书法家：即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的蔡襄，正楷“志气赫奕、大字冠绝古今”的蔡京，“得古笔法”、“遒劲处不减君谔”的陈说。明代有海内外知名画家李在，他创作的《云无心以出岫》、《抚孤松而盘桓》、《临清流而赋诗》等作品，被誉为传世稀有之作。曾鲸的艺术成就达到极高境界，《中国绘画史》称他的画是“神品”，赞他的画是明代 300 年间“首屈一指”。清代郭尚先的书法绘画，更是闻名遐迩的艺术珍品。近现代的江春霖、张琴、李耕、李霞等书法绘画艺术作品，均被视为瑰宝，世代留芳。

(五)史志堪范。莆仙文人世代以写史修志为荣，他们或在任京官、地方官期间，或回乡以后，精心搜集资料，研究全国或地方史，埋头著述，写出一批价值连城的史学、志书。宋

代郑樵纂写的《通志》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巨著，其史学价值和编纂体例，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陈均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数十卷，杨兴宗修成《四朝会要》，都是有影响的史书。据不完全统计，两宋莆仙人的史学著作有 45 部、5140 多卷。明代，邹守愚著述《史疑》、郭良翰著述《忠义汇编》、余光著述《春秋存轶》、余鹏著述《史论》、黄斌柳著述《东南纪略》、郑郊著述《史统》、柯维棋著述《宋史新编》等，这些全国性的史学著作观点及史料，对时人及后代产生重要影响。地方志书，宋代有《莆阳图经》、《莆田志》、《莆阳比事》、《仙溪谷志》等志书，其中《仙溪谷志》为全国流传至今的最早县志之一。明代，有状元林环参与编修当时全国图书集成《永乐大典》；明洪武年间方朴著《莆阳人物志》；天顺年间进士彭韶著《莆阳志》；成化年间进士彭甫著《仙游县志》；宋端仪著《莆阳人物备志》、《莆阳遗事》、《乡贤考证》；周华著《游洋志》；林有孚著《林凌志》、《木兰陂志》；黄天全著《九鲤湖志》；弘治年间(1488~1505 年)进士黄仲昭修成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并与周瑛合修《兴化府志》，是兴化古代仅存的一部府志。清代和民国时期，兴化人修志仍延绵不断，为中华文明留下宝贵遗产。

(六)科技兴隆。早在宋朝，名臣蔡襄就撰写了《荔枝谱》，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树栽培学专著。明朝，名医方炯将行医中积累的治病经验成书，著述《杏林村肘后方》10 卷、《伤寒书》、《脉理精微书》2 卷，为我国医学发展做出贡献。莆人陈姓开创晒盐法，推广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成果累累，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水稻育种专家陆财、甘蔗专家林金涌、半导体专家林兰英、航天专家闵桂荣、医学家余文光；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评论家许怀中、作家郭风、画家李耕、戏剧家陈仁鉴等全国性有影响的名人。

纵观上述，莆仙人文荟萃，代代流传，历史上蔡襄的德政，郑樵的著述，刘克庄的文学，陈文龙的忠贞，郑纪的清正，江春霖的刚直，一大批仁人志士，青史留芳，声名远扬。近、现代，莆仙又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出类拔萃的人物。现有莆田市籍高级人才 2000 多名，分布在国内外。可见，莆仙籍的人才精英，在各条战线上龙虎际会，群星灿烂。

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境内文物古迹灿若星河。有雄伟的寺庙，庄严的殿宇城堡，巍巍的石塔、石坊，还有壮观的陂堤、桥梁，轩昂的府第、古街、古树，以及遗存丰富的古遗址、古墓葬、摩崖石刻、出土文物、革命纪念地、革命文物等，不但种类齐全，而且保护完好，其中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据考证，在西天尾、江口、城郊、灵川、大济、园庄等地有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日岛、石山庄有商周文化遗址。著名的文物古迹有周代的古铜铤、窄弧刀；有汉代的遗址越王台、蛇湾城、鸡子城；有南朝陈的名刹广化寺，隋朝的古刹龙华寺、三会寺；有唐代的文物遗址，千年古荔宋家香，古建筑之花道观三清殿以及国欢寺、凤山寺大殿、九座寺大殿和无尘塔；有宋代建的中国水利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

大型水利工程木兰陂，以及神奇的释迦文佛塔和名楼伟观的古谯楼等。这些古迹遗址，艺术精湛，华光焕发，造诣深邃，以其古朴、雅致的风姿，在国内外古建筑类别中独领风骚，璀璨夺目。历代名流蔡襄、郑樵、朱熹、文天祥、陆秀夫、戚继光、徐霞客、郭沫若、谢觉哉等，皆在这里留下足迹及珍贵的诗文墨宝。

远远近近数丰碑，方方面面看未来，莆仙这个“古府新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湄洲湾将成为对外开放的门户，妈祖庙的圣地湄洲岛将成为两岸通航的码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宏伟的战略目标中，兴化儿女将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奋发努力，开拓进取，努力建设新兴港口城市，将再创辉煌，续写新篇。

## 第二章 城市名片

### 湄洲妈祖

湄洲妈祖：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

### 壶公山

壶公山，简称壶山，海拔 710.5 米，耸立于荔城南面，兴化平原西侧。巍峨俊秀的壶公山是闽中地区的名山。

### 木兰溪

木兰溪是莆田人民的母亲河，她发源于戴云山脉支脉的笔架山，流经莆田，迂回于兴化平原，这里是莆田水系最为发达、物产最为富饶、耕地最为集中、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带。

### 湄洲湾

湄洲湾：被誉为“世界不多，中国少有”的天然深水良港。

### 九鲤湖

九鲤湖原名九里湖，位于仙游县北部山区钟山镇。相传汉武帝时，安徽庐江何氏九兄弟在此炼丹并跨鲤升天成仙，故得名。

### 莆仙戏

莆仙戏是中国现存戏剧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原名“兴化戏”，是在古代“百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莆仙戏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闪光于现代。它表演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影响，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唱腔丰富，综合了莆仙的民间歌谣俚曲、十音八乐、佛曲法曲、宋元词曲和大曲歌舞的艺术特点，用方言演唱，具有浓厚地方色彩，迄今